

福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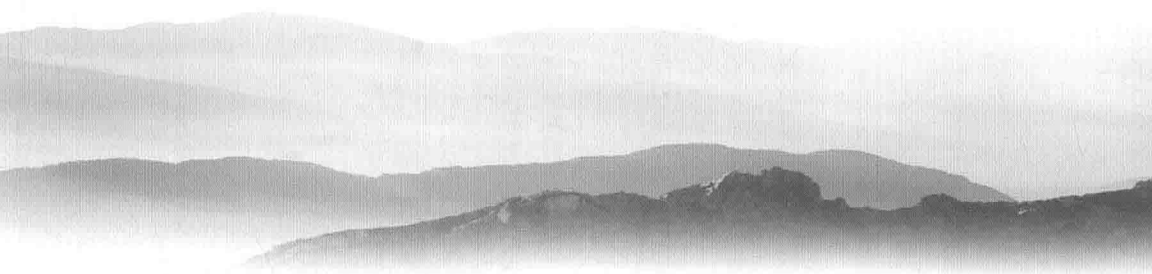
林建 郭乐兴 ©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HAIKIA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在贵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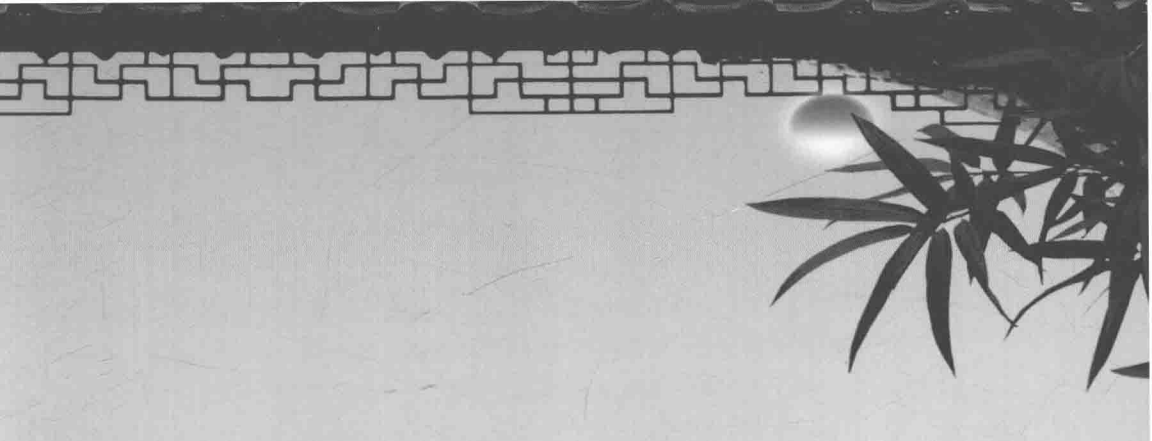


序

201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陪同上海市党政代表团考察对口帮扶点贵州赤水市，沿途在迎宾车上从当地宣传广播中听到有关赤水竹的介绍，说贵州赤水百万亩竹海的形成要感谢200多年前一位福建老乡——黎理泰。传说乾隆三十四年（1769）他携三个弟弟从福建上杭县老家带了4株楠竹到赤水栽种，这象征黎家四兄弟在异地安家落户、生根发芽。后来4株竹苗存活了3株，黎氏兄弟以此为基不断扩种，几年后房前屋后楠竹成林。由于楠竹用途多，四方农民纷纷登门索求母竹。几十年后，赤水河沿岸方圆几十里山坡便长出漫山遍野的楠竹，赤水也成为全国闻名遐迩的竹海。

这个故事深深触动了我，很想找机会考证和了解“福建人在贵州”的历史和足迹。可遗憾的是公务缠身，始终没有机会实现心中的愿想，眼看在贵州两年的挂职就要期满，心中不免有些怅惋。所幸贵州省福建商会郭乐兴先生和青年作家林建先生，他们经过艰苦努力，创作了《福建人在贵州》一书。该书不仅实现了我的夙愿，而且还让我开了不少眼界。

贵州是一片多彩神奇的地方。这里不仅风光旖旎、山水秀丽、生态优美，而且民风淳厚、民族风情浓郁，是全国难得的旅游避暑胜地。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地处偏隅，山高险阻、交通不畅、信息闭塞，这里与外界交流甚少。在古代商旅、谪宦视此为畏途，甚或为恐怖之乡。随着明清两朝“改土归流”政策的逐步实施，贵州加快了与外界的交往。“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慢慢掀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留下了林则徐、林品南、林绍年、卢化鳌、萨镇冰等闽籍名人先贤的政绩和足迹，他们为贵州的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坊间还流传着福建赖氏家族创建赖茅酒（茅台酒前身）等美丽佳话。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通讯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成绩，贵州已经成为当今全国深化改革的一片热土，成为后发赶超、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风水宝地。如今28万八闽儿女正驰骋在贵州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他们或从商、或从政、或从戎，辛勤耕耘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贵州的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福建人在贵州》一书向人们展示了史上，特别是明清以来福建人在贵州从政、经商的部分史实。本书的出版，对人们了解福建人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为闽黔两地经济、文化、政治的交流与合作及两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定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张家团

2014年11月9日于贵阳

（作者系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室副秘书长）

前言

长期以来，福建人凭借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勇敢，为贵州的社会繁荣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一批批闽籍英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和支持贵州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也为八闽大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的新作新为，已汇聚成一种永不磨灭的时代精神，值得我们去提倡和大力弘扬。

明清时期，就有福建人来到贵州从事商业活动。改革开放之后，相继有二十多万名福建人到贵州投资创业，在房地产、冶金、化工、煤炭、建材、机械、环保、水电、旅游、运输、服装、通信等产业辛勤垦拓，总投资规模达上万亿元。福建人带来的民间资本有力地推动了贵州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贵州这片热土上，闽籍企业家与当地各族人民群众一道，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取得了可喜的业绩，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闽商从八闽大地来到贵州高原，一直以“胸怀天下，心系国家”的情怀，把企业发展与国家发展、个人致富与国家富强紧密联系起来，在企业发展和个人致富的同时，始终不忘奉献爱心，扶贫济困，报效桑梓，回馈社会。作为在黔最大投资群体，“爱拼才会赢”的闽商正发扬敢做敢闯的拼搏精神，以更宏大的气魄，积极融入贵州“两加一推”的历史潮流，续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为了展现这闽籍商人的风采，弘扬其奋斗精神，增进福建与贵州各地人民的友好交往和合作，笔者创作了《福建人在贵州》一书，概述历史上福建人在贵州的丰功伟绩，希望抛砖引玉为福建、贵州两地经济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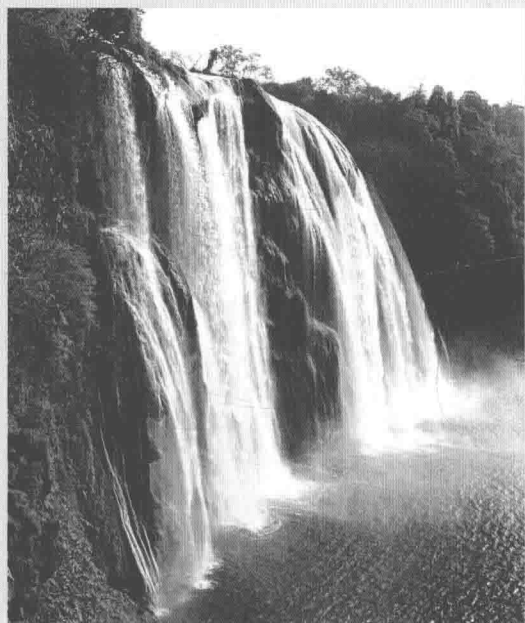
第一篇章	历史贵州	/1
	烟雨沧桑话贵州	/2
第二篇章	闽人的历史遗迹	/11
	贵州各地的天后宫文化	/12
	镇远天后宫	/19
	毕节天后宫	/22
	黄平旧州天后宫	/27
	镇远紫阳书院	/29
	遵义竹海国家森林公园	/31
	陈孔俊将军墓	/33
	贵州桐梓海校	/35
	思南府官立高等小学堂	/37
	镇远文明书院	/40
	贵州赖茅酒	/42
	贵州《大定县志序》	/44
第三篇章	黔地闽人英彦多	/47
	伏阙上书太学生——陈璟	/48
	宋朝贵州都匀中丞大夫——张明谦	/50

留屯驻防贵州的长乐军士——郑纲	/52
明代贵州布政使司左参议——翁世用	/55
明代镇远知府——周瑛	/59
清贵州提学佥事——林麟焯	/62
明户部贵州司主事——卢化鳌	/66
清代遵义昭勇将军——陈孔俊	/71
赤水河畔创赖茅——赖氏家族	/73
清代四品候补道——朱孔璋	/76
赤水引竹的第一人——黎理泰	/80
清乾隆贵州两府知府——郭鸣高	/84
清代云贵总督——林则徐	/87
贵州第一县令——林品南	/92
晚清贵州巡抚——林绍年	/97
贵州思南府知府——曾宗彦	/102
中国海军的模范军人——萨镇冰	/106
闽县状元督贵州乡试——王仁堪	/111
清代福建官员在毕节	/115
贵州最后一个封疆大吏——沈瑜庆	/118
第四篇章 闽黔的溯源延伸	/121
闽人与贵州的三次大移民	/122
闽黔两省畲族的特点	/127
贵州安顺屯堡与福建客家土楼	/133
明清时期外来作物引入贵州	/138
从古田会议到遵义会议	/144



第一篇章

历史贵州





烟雨沧桑话贵州

西南高地，蜿蜒曲折的山脉，如浪一般横贯四方，醉人风情在一重重峻岭下演绎。绵延纵横的景，是一个又一个如诗如画的情，高山和流水，就这样描绘着贵州的动与静。

千百年来，贵州的山都这么矗立着，贵州的水也这么流动着。贵州的人们每天忙碌着，贵州的成长也演变着。动与静，就这样在贵州重峦叠嶂的高原上变化着。

水静卧着，山绵延着，两者不求相依，守望着。山有山的粗犷，水有水的灵动，相依着。在人们的脚步声里，默默地浑然一体。

一、历史沿革

贵州建省虽然只有500多年，但是贵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得更远。贵州是古人类发祥地之一，远古人类化石和远古文化遗存发现颇多。据考古，中国南方主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多是在贵州境内发现的。

春秋时期，当时在今贵州境内有牂牁古国，并与中原有交往。战国时属于楚国的黔中郡，地域面积在今贵州沿河到榕江以东，包括铜仁地区和黔东南部分县。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贵州分属巴郡、蜀郡、黔中郡和象郡管辖。西汉初年，贵州分属益州刺史部犍为郡和牂牁郡。犍为郡管辖今贵州北部、四川南部、重庆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牂牁郡管辖今贵州南部及周边地区。西汉中晚期，贵州北部大部分地区划入牂牁郡管辖。牂牁郡领14县。三国时蜀国牂牁郡治且兰（今贵州凯里西北）。领7县：且兰、毋敛、广谈、警县、平邑、夜郎、谈指。唐朝曾在此设黔中道，建黔州郡，设黔州都督府。唐代贵州境内出现了几个对后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地方土司政权。

“贵州”名称，始于宋朝。974年，土著首领普贵以控制的矩州归顺，宋朝在敕书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一语，这是以贵州之名称此地区的最早记载。除此以外，还有另一种说法，指贵州的名称源自“罗氏鬼国”；因为“鬼”不好听，才转音为“贵”。中国彝族的先民曾被称为“罗罗”或“罗苏”。在唐宋时代，随大理国崛起，彝族部落开始越过乌蒙山，在今天贵州地区广泛发展。他们在唐末已形成较大的独立政权，被称为“大鬼主罗殿王”。宋末，贵州中部有罗氏鬼国，或称为罗施鬼国，依附于宋；南部则有罗殿国，依附于大理。

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置八番罗甸宣慰司。至元十九年（1282），设顺元等路军民宣慰司。至元二十九年（1292），顺元、八番两宣慰司合并，设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于贵阳。后来又以乌江上游的鸭池河为界分为水东、水西。水西由安姓土司统治。水东由宋姓土司统治。至明初，彝族土司管辖今贵州省除遵义、铜仁、黔东南之外的大部分地区。

到了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正式建制为省，以贵州为省名。废思州宣慰司与思南宣慰司，保留水东土司与水西土司，同属贵州布政司管辖。清雍正五年（1727），将四川属遵义府，广西属荔波及红水河、南盘江以北地

区，湖广属平溪、天柱，划归贵州管理辖。将贵州属永宁州划为四川管理辖。

贵州的历史总离不开一个“黔”字，代代相同，直至贵州建省。这就是贵州简称“黔”的由来。

二、地理概述

贵州地貌属于中国西南部高原山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高原山地居多，素有“地无三里平”之说。全省地貌可概括分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四种基本类型，其中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境内山脉众多，重峦叠峰，绵延纵横，山高谷深。北部有大娄山，自西向东北斜贯北境，川黔要隘娄山关高1444米；中南部苗岭横亘，主峰雷公山高2178米；东北境有武陵山，由湘蜿蜒入黔，主峰梵净山高2572米；西部高耸乌蒙山，属此山脉的赫章县珠市乡韭菜坪海拔2900.6米，为贵州境内最高点。

而黔东南州的黎平县地坪乡水口河出省界处，海拔为147.8米，为境内最低点。贵州岩溶地貌发育非常典型。喀斯特地貌面积109084平方千米，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61.9%，境内岩溶分布范围广泛，形态类型齐全，地域分布明显，构成一种特殊的岩溶生态系统。

乌江、南盘江、北盘江、都柳江等水力资源丰富，黄果树瀑布尤为著名。

贵州的气候温和湿润，年降水量1200毫米左右，中部一带多云雾阴天，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温变化小，冬暖夏凉。省内有“中国避暑之都”贵阳，“江南煤海”六盘水，“中国酒都”仁怀，“世界遗产”赤水丹霞、荔波喀斯特、侗族大歌，有亚洲最大最美的瀑布、溶洞。

三、改土归流

所谓改土归流，狭义讲是指形成于元、发展于明、结束于清的贵州土司制度管理，变为中央王朝派流官来管理；广义讲，贵州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一旦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管理，统治者采用民族政策，虽各个时代有差异，但都离不开派流官来管理，或者利用当地土官来管理。中央王权如政权更迭不休，或巩固困难，无力顾及，则土官会发展壮大，长期割据，影响中央王朝统一，必定对流官造成巨大威胁，争斗不可避免。中央王朝一旦看到这里重要政治和军事战略价值，必定对这地区加强开发，派军队镇压土官，加强流官管理，获取战略物资需求，或者借道去征服边远少数民族割据，自雄称霸一方封建领主。从有文字记载的2560年贵州史中，我们领略了这个争斗焦点演绎的一部血与火的历史。

在秦汉版图中，中央王朝四周有四夷（夷是当时对少数民族的称呼）：匈奴，西羌、百濮、西南夷。西南夷中的“南夷”有“耕田，有邑聚”的人口村落和城镇的定居农耕社会。百濮（东南沿海少数民族）是移秆的半农半牧经济，匈奴、西羌是“随畜迁徙”的半农半牧经济，南夷定居农耕经济稳定，也带来人口稳定发展，是“四夷”中人口最多的，因而在政治上是显赫的群体，在中央王朝眼光中是有地位的。

秦统一六国后，曾经把眼光略微看到古夜郎，便派常安页修五尺道。五尺道从今川南宜宾，入滇东北进黔西北，过赫章、威宁，复云南曲靖，支线由汉阳县通婺县到遵义贵阳一线，即今合江县、赤水、习水到桐梓去遵义贵阳。秦统一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古贵州设为黔中郡。以掌兵权的“尉”为一郡的最高长官，设郡临朐“察事”，皆有县令。黔中郡各县受制于握有重兵的最高长官。这是“流官”管理，为戍守和开发南夷，曾多次遣发中原人士和成年女子前去婚配，日久他们都融

进当地少数民族群体中。

从汉王朝建立到汉武帝的70年间是休养生息换来国力富强时期，南夷各地均处于自保状态。汉武帝时期，北方匈奴威胁排除，为结束南越的割据，实现统一，开发和管理南夷提到议事日程，制定了“和平内属”“以其故俗治”政策，即不强迫当地少数民族改变世代相袭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意识信仰，不按内地制度强行改变社会形态，土流并治。《史记·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南中志》提到的吴霸、陈立、万年、周钦、谢暹等，便是汉中央委任的“流官”，而对于夜郎各部的“君长”“邑君”等大、小首领，汉中央仍加以承认，任随他们按原有习惯掌握本部事务，保持他们独立经济和社会地位。而不服“流官”管理，或者少数首领以武力破坏统一，制造骚乱，则用重兵镇压或者诛杀其君长、首领。如治南夷时用兵镇压了夜郎中一些顽固势力，诛且兰国君，陈立太守诛夜郎国君王兴。不料，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除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由于叛乱规模较大，陈立奏请招募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与都尉万年等分头攻击叛乱者，“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夜郎王国此后不复见于记载，其政权在此时绝灭。夜郎王国的灭亡导致了夜联盟因失去中心而瓦解，此后原联盟成员多散而不聚。陈立太守诛杀夜郎王兴及斩翁指的消息传开，鉤町王禹，漏臣候愈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他们惶恐不安地表示继续臣服于汉王朝。鉤町王国未能取代夜郎王国而成为新联盟盟主。但它国的势力向牂柯、益州、郁林三郡交接地带扩展，成为“三边蛮夷”的核心。新莽时期王莽改变汉制，施行错误民族政策，王莽令五威将军王奇等12人，带着符命，印绶给“四夷”更名，“皆受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五威将帅出，改鉤町为候”引起当时鉤町王邯怨恨，王莽乃命牂柯大尹周钦诈杀邯。邯弟承为兄报仇又攻杀周钦，王莽令所有州郡出兵攻击鉤町未能奏效。在王莽歧视和掠夺少数民族政策

施行下，三边蛮夷愁怨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王莽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发天水，陇西骑士及广汉、巴、蜀、犍为诸郡吏民兵者10万人，20万人运送辎重，前去征讨，后更换廉丹，遣派复位大司马郭兴，庸部牧李晔、周师和仲曹助部兴出击鉤町。这样，在整个新莽时期的十几年中，鉤町及其影响下的“三边蛮夷”一直被大规模征讨，但他们没被镇压下去。总之，两汉期间采取“和平内附”按“故俗”治理政策，在南夷各少数民族群体的配合下，基本上做到夷、汉相安，同时还推行了“募豪民田南夷”移民屯田政策，配合郡县设置及军队驻防，使这里的局势长期保持稳定状态。

三国时，刘备在成都建立了蜀汉政权。包括四川大渡河以南、云南、贵州大部分及广西北部沿边地区，古为“夷越之地”的南中，成为蜀国的后方。南中的稳定对蜀国是命运攸关的。蜀国采取了“西和诸戎，南扶夷越”的处理各民族关系的方针，采取了政治招徕政策，派“流官”李恢任降都督，坐镇平夷（贵州毕节）管理南中。然而不能奏效，南中大胜，夷师乘蜀国与孙吴搞衡，无暇顾及南中之机，据地称雄，纷纷起兵反蜀。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作了南征准备，出征南征胜利后，对南中郡县设置增多，派出“流官”增强，加强了统治与开发，各少数民族群体“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进一步发展定居农业。

魏晋南北朝，中原丧乱，南北长期分裂，政权更迭不休，中原王朝无力顾及古贵州。西晋“永嘉之变”少数民族纷纷起义，据地称雄，盘踞在贵州的南中大姓“龙、傅、尹、董、谢”等，加剧割据地盘，无力开发经济，时间长达250多年。

隋朝流官权势不大，主要由土著首领治理。

唐王朝沿袭秦汉旧制，实行内附性质的羁縻政策，即愿意归附的土著首领，赐以疆土，封予官职，允许世袭，“以夷治夷”地区社会相对稳定。土官入京朝贡，

带去了大型民族歌舞表演并取得轰动效应。寺官不定期入京朝贡，往往赏以将军、大将军、王等官衔爵。通过朝贡，既密切了贵州少数民族群体与中央王朝的政治统属关系，又促进了贵州民族文化与京都文化的交流。但逢唐与南诏的战争不断，贵州处于中间地带，不可能进行开发。

宋承唐制，凡少数民族首领献地归附，即以其地置州县长官司，“皆以番夷酋长之长”的土官治理。宋太祖下诏说：“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从此才出现贵州之名。宋太祖这道诏书便是安排贵州少数民族首领的。并且封他为官，让他服从中央王朝管辖。

元代设“站赤”（驿道）与全国各地沟通，但将贵州地域纳入四川、云南、湖广三行省。中央王朝在这里推行土司制度，实行“汉夷兼治”之策。参用少量流官，土职“以番夷酋长为之者实多”，大小土司百多林立。至明代，土司制度发展到鼎盛。对土司领地采取“土流兼治，军政分管”的方针，设卫屯兵对土司进行交错控制，逐渐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但三省都把这里当作边地任由大小百余土司以领主制世袭统治。

从战国、秦汉到元末，长达1780年，贵州就有上千年处于中央王朝开发圈之处，长期处于主流社会之外，分合无定。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是很难与发达地区及政治文化中心密切联系，加上自然条件处于劣势，八山一水，又有落后的社会结构及生产关系，社会 and 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发展缓慢，相对封闭保守。

明王朝建立，朱元璋认识到：“那个三不管地带，恰恰是头等经营大西南军事战略要地。”稳定西南，才能巩固全国统一大局。他的著名军师刘基（号伯温）认为：“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为明代千秋基业着想，他们施行了“改土归流”的民族政策，1382年初，征南胜局在握，朱元璋下旨：成立贵州都指挥司，分兵沿干线建立卫和所。都使司相当省军区，我们贵州，

迈出了建省第一部。他派他内弟马烨驻镇今天贵阳为首任都使司，代以流官统治寻借口，与水西土司首领奢香过招，但奢香为民族利益忍辱负重，千里迢迢，赴南京告御状。在土官与流官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朱元璋作了智者选择：“奢香归附，胜过十万雄兵”，处斩了马烨，流官的人头成了贵州初开省级建制的祭品。但明王朝改土归流政策必定还要施行。1413年3月3日永乐皇帝诏诰天下：“今设贵州布政使，列为第13个省。”贵州以一省的名分列入中央王朝视野。永乐帝以流官组建了布政司——省政府，同时派出五万虎狼之师严阵以待，借思州、思南两个宣慰使之争，采取斩首行动，两个宣慰使被斩首，两个宣慰使被废除，地盘设八个府，府机关全由流官组成。土官掌权被废除，由流官当政。这是改土归流的突破，也是开端，在此基础上，建贵州布政司——省机关，按朝制设左、右布政使（相当于省长）全由流官组成。次年，司法监察机构按察使司配置完毕，省一级建制基本完备。

1600年明末平播之役是继永十一年平定两思土司之争建立贵州布政司之后，明代调动八省24万兵力分八路围剿播州土司杨应龙而进行重大的改土归流事件。是官、土两方矛盾已达白炽化程度，非大战不足以平息的唯一选择，是流官制与土司制的大决战。决战的结果显而易见，这是一场非均衡的战争。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明王朝是正统，战争的政治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割据和分裂，以利于人民安居乐业，顺应民心，政治上处于绝对优势。杨应龙举旗反叛，破坏社会稳定，造成国家动乱，人心背向，政治上处于绝对劣势。平播之役的胜利，为改土归流的政治变革扫清障碍。仅仅两年，贵州全面进行了“改土归流”政治变革。

清代改土归流，重点是治理“苗疆”（即黔东南少数民族聚集区），将过去尚未设流官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统一行政建制。结合“改土归流”将原属四川的遵义府和乌撒府划归贵州，从此确定了现今贵州的境域。



舞阳河两岸保留了诸多福建遗风

“改土归流”打破了一个个土司割据的壁垒，建立起如同内地一样的府州县，将长期盛行的封建领主制摧毁，把土地和人民纳入国家“户籍”使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融入社会主流圈内，从而使贵州社会经济向内地靠拢，加快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改土归流”顺应历史潮流，具有社会进步意义，是一场极其重要的历史变革，但姗姗来迟，它革除了人身依附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它的土地受人民承种，极大地促进农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的发展，它使文化教育进入一个新发展时期，出现了“三千举人，七百进士”盛况，清代还出现了“三状元一探花”，打破了2000多年来贵州无状元的零纪录，对社会的发展带来积极结果，“改土归流”是贵州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第二篇章

闽人的历史遗迹

